

比较

COMPARATIVE STUDIES

51

吴敬琏 主编

楼继伟

未来15年中国经济的风险、动力和政策挑战

蔡 昉

关于结构调整的国际经验

罗伯特·福格尔

亚洲奇迹对经济增长理论的影响

约翰·泰勒

大偏离的宏观经济学启示

伊藤隆敏

大通胀与日本央行的独立性

理查德·泽克豪泽

投资于未知且不可知的事物

崔秉浩

韩国的养老金改革

池上直己

快速老龄化日本的医疗保健融资

约翰·阿穆尔 等人

法律与金融发展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比较

COMPARATIVE STUDIES

51

吴敬琏 主编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比较·第 51 辑 / 吴敬琏主编.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5086-2614-7

I. 比… II. 吴… III. 比较经济学 IV. F06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49136 号

比较·第五十一辑

主 编: 吴敬琏

策 划 者: 《比较》编辑室

出 版 者: 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承 印 者: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29mm1/16

印 张: 11.7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86-2614-7/F·2218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400-696-0110

<http://www.caing.com>

010-58103380

E-mail: service@caixinmedia.com

卷首语

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增量超越美国居世界第一。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说，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30年中完成了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在前十几年的时间中，成功地摆脱了贫困陷阱。第二个飞跃是以第一个飞跃为基础，在后面的十几年中使得人均收入上升，按购买力平价达到人均8000美元左右，站在了中等收入的门槛前。然而，国际上成功实现从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国家的例子并不多见，不少国家深陷“中等收入陷阱”无法自拔。2007年我们组织的国际经济学会“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圆桌会议”，关注“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提供了东亚和拉丁美洲国家发展中的经验与教训，当前，快速发展积聚的各种矛盾日益显现，正在不断蚕食改革开放的成果，单靠“头疼医头、脚痛医脚”式的政策或权宜之计，而不推行系统协调的整体性改革，就极有可能把我们带入“中等收入陷阱”。为此，我们需要对许多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与讨论，提供可行的改革方案。面对中国目前正处于的重要时点，本辑《比较》仍将以国际比较制度分析的视角，讨论中国应该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成功实现转型。

开篇楼继伟的《中国经济的未来15年：风险、动力和政策挑战》紧紧抓住中国处于中等收入门槛时，如何面对未来15年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政策挑战。文章以数据分析，对中国、日韩等亚洲成功国家与地区以及拉美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经济增长情况，进行比较，作者提出需要启动哪些方面的改革，才可以保证持续增长的动力，才可以在20年左右的时间里步入高收入现代化国家的行列。他特别强调长期与短期的权衡。他说，“有一个长期目标，考虑到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而且不因为各种短期的权衡和考量而损害长期的制度和机制建设，将是非常重要的。制度设计往往围绕现实矛盾展开，但现实矛盾通常是短期利益和即期表象的反映。改革必须立足长远，也必然对短期利益作出一些权衡妥协，但妥协的结果最终应该逐步收敛，向长期均衡点逼近。”

蔡昉的文章《温故而知新：关于结构调整的国际经验》则从经济结构转型的角度，探讨经济到达刘易斯转折点后面的一系列崭新挑战。他认为，当前面临三个主要的挑战：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替代过去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投入；用劳动力的质量替代劳动力的数量；形成劳动力市场制度和劳动力供求关系共同决定工资的机制。面对这些挑战，如果应对不当，伤及增长的可持续性，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他还用日本和韩国的经验，说明工资协商机制对

改善工资收入差距、减少劳动争议的重要作用。

在“前沿”栏目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福格尔结合中国、印度及其他东南亚经济体的蓬勃发展探讨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文章回顾了自二战以来经济增长理论取得的进展，对各经济学家和相关流派的增长理论进行了梳理，并分析了未来几十年亚洲经济快速增长对全球经济格局和经济增长理论的影响。著名宏观经济学家、最广为应用的货币政策规则——泰勒规则的提出者、斯坦福大学教授约翰·泰勒认为，自2003年开始，欧美主要国家就开始偏离规则导向型宏观经济政策，金融海啸发生后，这种做法非但没有消除，反而愈演愈烈，众多的相机抉择型政策干预主义色彩更加浓厚、其走向更不可预测。他认为，对规则导向型政策的“大偏离”会扼杀稳定，孕育衰退，可谓贻害无穷。

伊藤隆敏既是日本著名的经济学家也曾参与日本的政策决策，他的《大通胀与日本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一文，对比分析了日本中央银行在第一次石油危机和第二次石油危机时期不同的政策行动导致的不同后果：第一次石油危机期间，缺乏独立性的日本央行未能对经济形势变化作出及时反应，导致通胀加剧；在第二次石油危机期间，事实上独立的日本央行根据形势变化迅速应对，正确决策，因而有效控制了通胀。作者从中得出的结论是，日本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对于日本在两次危机期间不同的通胀后果有着重要影响。

哈佛大学教授理查德·泽克豪泽讨论的是在未知且不可知的情形下，如何进行好的投资。作者对未知且不可知的情形按程度进行了分类，并提出了相应的投资策略，如三叉戟投资、跨斗投资等。文章还具体探讨了经济学和金融学领域的许多理论问题，如信息不对称、肥尾、行为经济学中常见的过度自信、记忆偏差、误判概率和偏好等决策问题。可以说，这是一篇投资实战和经济学理论分析兼备的文章。

本辑的“社保专栏”分别介绍了日本和韩国迅速进入老龄化社会后在养老和医疗保健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目前的韩国存在多重养老金体系，不同体系覆盖的人群享有不同的福利，其中公务员养老金体系享有高福利和低缴费率，因而不可持续，也使得其他体系覆盖人群对此非常不满。如何使养老保险具备可持续性，并将各种养老保障体系并轨，是韩国面临的最大问题，崔秉浩的文章对此进行了分析。而日本医疗保险体系面临着更严峻的问题，其迅速的老龄化已经使现有的医疗保险体系不堪重负。池上直己的文章讨论了如何在不增加下一代人负担的情况下，有效地为日本医疗保险融资并控制支出，以确保其可持续性。

“法和经济学”栏目是牛津大学法和金融学教授约翰·阿穆尔等人对法律和金融发展的研究。他们按照时间顺序，以1995年至2005年间的25个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转型国家为例，论证了公司法和破产法的发展趋势，并将这些信息与基于对法国、德国、印度、英国和美国在1970年至2005年这36年间情况所作的更深入的研究结合在一起，从实证角度探讨了法律起源和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

目 录

Contents

第五十一辑

- 1 中国经济的未来15年：风险、动力和政策挑战 楼继伟
China's Economy in Next 15 Years: Risks, Impetus, and Policy
Challenges *by Lou Jiwei*
- 14 温故而知新：关于结构调整的国际经验 蔡 昉
Lessons from the Past: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about
Restructuring *by Cai Fang*

前沿

Guide

- 22 亚洲奇迹对经济增长理论的影响 罗伯特·福格尔
The Impact of the Asia Miracle o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by Robert W. Fogel
- 53 大偏离的宏观经济学启示 约翰·泰勒
Macroeconomic Lessons from Great Deviation *by John B. Taylor*

比较之窗

Comparative Studies

- 62 大通胀与日本中央银行的独立性 伊藤隆敏
Great Inflation and Central Bank Independence in Japan
by Takatoshi Ito

金融论坛

Financial Forum

- 90 投资于未知且不可知的事物 理查德·泽克豪泽
Investing in the Unknown and Unknowable
by Richard J. Zeckhauser

社保专栏

On Social Security

- 130 韩国的养老金改革 崔秉浩
Old-age Pension Reform in South Korea *by Byongho Tchoe*
- 148 迅速老龄化的日本如何为医疗护理融资 池上直己
Financing Health Care in Rapidly Aging Japan *by Naoki Ikegami*

法和经济学

Law and Economics

- 160 法律与金融发展：时间序列证据能给我们什么启示（上）
约翰·阿穆尔 西蒙·迪金 维维安娜·莫利卡 马休斯·西姆斯
Law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 What We Are Learning from the
Time-Series Evidence
by John Armour, Simon Deakin, Viviana Mollica and Mathias Siems

中国经济的未来 15 年 风险、动力和政策挑战

楼继伟

过去 15 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 9.6%。按市场汇率计算，人均 GDP 从 1995 年的 600 美元跃升到今年约 4 000 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标准，已经从低收入国家进入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①。在未来 15 年，中国经济能否保持它过去的增长表现？本文在对经济增长的国际比较的基础上，讨论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的风险和动力以及相关的政策挑战。

经济增长的国际比较

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佩恩表（Penn World Table）的购买力平价数据^②，中国的人均 GDP 在 1995 ~ 2010 年期间由 3 000 美元提高到 10 000 美元

* 本文根据作者在 2010 年 11 月 1 日“中金论坛”上的讲话修改而成。

① 世界银行 2009 年的收入分组标准是：人均国民总收入（GNI）低于 995 美元为低收入国家，在 996 ~ 3 945 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在 3 946 ~ 12 195 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高于 12 196 美元为高收入国家。

② 本文采用基于购买力平价（PPP）汇率的人均 GDP 值进行国际比较。PPP 汇率是指根据各国不同的价格水平计算出来的货币间的等值系数，它有助进行发展水平和结构演变的国际比较。由于市场汇率仅反映贸易品的相对比价而且在短期容易受到资本流动、政策扭曲等因素的影响，以其为基础所换算出来的 GDP 容易扭曲各国的实际经济水平，而基于 PPP 汇率的 GDP 能更好地反映一国所生产的经济实物量的多少。需要指出，PPP 汇率并不暗含对现实汇率调整方向的指引，其价值在于通过含有相对客观基准的国际比较，揭示结构演变的方向和政策取向。

(2005 年不变价)③。这相当于日本在 1951 ~ 1967 年, 台湾省在 1970 ~ 1987 年以及韩国在 1970 ~ 1989 年的发展阶段。如果我们在更长的时间内观察这些成功转型的亚洲经济体的增长经验, 可以发现两个特征: 第一, 它们都呈现了一种“倒 U 型”的增长模式。这些经济体从初期低收入水平和低增长的状态出发, 之后都经历了一段长时间的经济增长大幅加速的过程, 然后随着它们的收入水平趋近于发达国家的水平, 增长开始逐步减速。第二, 这些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保持很好的持续性, 在相对长的时期维持了较高的增速, 即在大约 30 年的时间内人均 GDP 年均增长 7% 左右和在 40 年的时间内人均 GDP 年均增长近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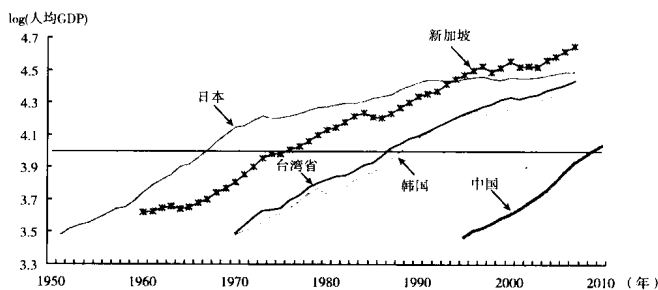


图 1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 GDP (2005 年不变价美元), 1950 ~ 2010 年
资料来源: Penn World Table 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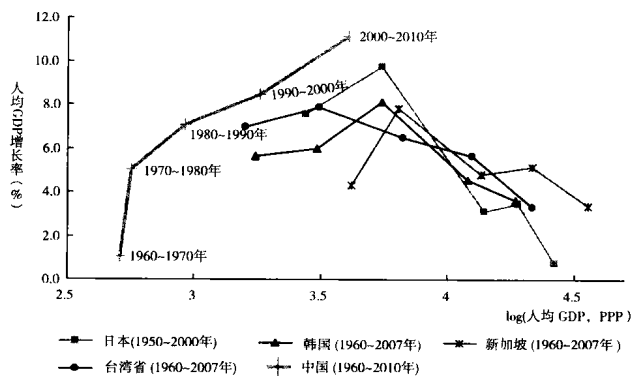


图 2 中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长期增长动态
(10 年期年均增长率), 1950 ~ 2010 年

资料来源: Penn World Table 6.3。

③ 由于 Penn World Table (V6.3) 数据截止到 2007 年, 本文假设 2007 ~ 2010 年的购买力平价汇率不变, 并用人均实际 GDP 增长率数据推算中国 2010 年的基于购买力平价的人均 GDP 值。

从更广的范围来看，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可能是二战后经济发展史中，仅有的从发展中经济过渡到发达经济的成功例子。在非洲和南亚，一些国家由于政治不稳定、种族和意识形态冲突等因素，还陷于“贫困陷阱”之中，从未实现经济起飞。过高的出生率、低储蓄率以及地理和环境劣势等也往往是导致“贫困陷阱”的重要结构性因素。而另外一些发展中国家，它们摆脱了“贫困陷阱”并在一段时间内实现较快的经济增长，但在经济发展水平远未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的时候，增长率即大幅下降甚至趋于停滞，进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典型的例子包括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拉美国家。这些国家在经历了 1970 年代的高增长之后，在 1980 年代初债务危机爆发后经济增长即趋于停滞，在其后 20 多年的时间里人均收入几乎没有提高。巴西、墨西哥的人均 GDP 长期停留在 9 000 美元的水平上，而阿根廷则徘徊在 11 000 ~ 12 000 美元的区间，仅最近几年它们的经济才有较大起色。在亚洲，马来西亚和泰国近年来的经济发展历程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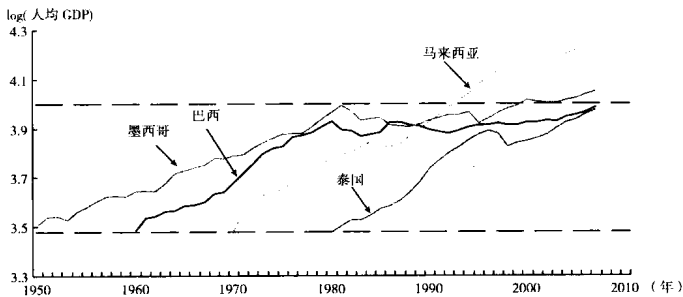


图 3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 GDP (2005 年不变价美元)，1950 ~ 2010 年

资料来源：Penn World Table 6.3。

中国过去 30 年的增长轨迹基本上重复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倒 U 型”经济追赶过程的前期阶段所走的道路。不过，与它们相比，由于我们相对稳定的政治制度、较早较快实现的人口转型、在建国初期由医疗和教育改善而带来的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以及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生产率提高，我们在较低的发展水平上就开始了经济起飞，并且在 30 年的时间里维持了一个更快的增长速度。特别是自 2003 年以来，由于我们在人口结构方面的有利变化，由于我们加快了一些促进劳动力转移方面的结构性改革，以及我们在上世纪末大量投资于基础设施提高了整个社会的供给能力，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可能已经超过了 10%。最近两年，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仍然保持非常快的增长。

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显然，我们不能把过去 15 年或 30 年增长趋势简单外推来预测中国的未来增长。经济发展的国际经验表明从中等收入过渡到高收入要比从低收入过渡到中等收入更为困难。当一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传统的增长部门（如劳动密集型出口部门）的竞争力会因为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而被削弱；随着与技术前沿的差距缩小，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将更多需要通过创新而不是简单的学习和复制来实现；同样由于将更多依靠创新来实现产品的更新和升级，生产多样化也将变得缓慢，企业只有提高产品质量才能避免贸易条件的恶化；当贸易部门的生产率增长放缓，国内市场的扩张和服务业的发展就成为经济成长的重要决定因素。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经济增长模式的一个根本转变，这种转变并不容易实现。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国内需求，即反映了我国面对中等收入转型的挑战而作出的战略调整。

如果说中国有“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最大的风险可能来自于收入分配方面。关于拉美国家收入分配恶化和经济增长停滞之间的关系，已经有很多讨论。与拉美国家相反，日本等亚洲成功者在其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保持了收入分配的相对平等。成功的土地改革、符合比较优势的外向型发展战略以及投资于教育实现广泛而平等的教育机会，都被认为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实现收入平等的重要原因。在高速增长的同时保持收入相对平等，使得中产阶级在这些国家和地区逐步发育成长并成为社会主体。在社会和政治层面，中产阶级的崛起促进了社会的融合和稳定，减少了精英掌控和社会分割的可能。在经济层面，中产阶级往往是企业创新和人力资本的主要源泉，其消费的扩张也为经济由外需向内需转型提供了重要支撑。

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在近年来持续扩大。从基尼系数来看，我国目前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高于日韩等东亚国家。城乡之间的差距一直是中国收入不平等的一个重要贡献因素。东西部之间、沿海和内地之间的地区差异也导致我们国家整体的收入不平等。市场化改革使得人们可以在更大程度上通过个人努力、技能、创新精神等实现其价值，而这些在计划经济时代都是被抑制的，这必然会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是一种良性的、恢复性的收入差距扩大（Chaudhuri 和 Ravallion，2007）。近年来，收入分配恶化几乎是一种全球现象，反映了经济发展的全球化以及技术进步的偏向性，如倾向于使用更多资本和高

技能劳动力，而减少使用低技能劳动者，这导致资本回报和高技能劳动力工资的增长持续快于低技能劳动者工资的增长。但我国在经济结构和体制上的一些缺陷，如仍存的对城乡劳动力流动的限制，资本、土地等要素市场的市场化改革不完全，部分行业存在的垄断，财政再分配功能的薄弱等，也是收入分配恶化的重要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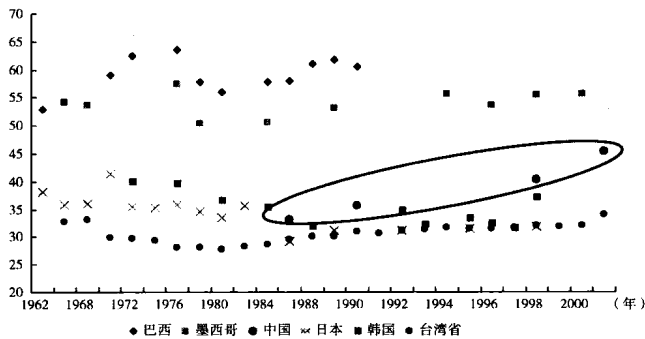


图4 收入基尼系数的国际比较

资料来源：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WIIDIC，http://www.wider.unu.edu/research/Data-base/en_GB/wiid/。

收入不平等容易带来社会和政治的不稳定从而影响经济增长。收入不平等也往往导致机会的不平等，当低收入群体没有能力和意愿投资于自身及其子女的健康和教育时，经济增长的长期潜力必然会受到损害。此外，当收入差距扩大的时候，社会分歧也容易加大，导致各种结构性改革难以推进。中国要成功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扭转当前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趋势。投资于跨区域的基础设施，建立起有效的社会安全网，以及保证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在地区和城乡间的均等分配，都应该是中国在未来几年改善收入分配的主要政策内容。最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五中全会已经提出，实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完善实施城镇职工和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进一步做实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实现跨省可接续。目前的收入分配形式决定了加速这些社会保障方面改革的紧迫性。

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

假设中国能够成功实现中等收入转型，不至于像一些拉美国家一样陷入陷

阱，一些结构性因素也可能导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将来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即使以日本和韩国这些亚洲成功者的经验来看，人均 GDP 以购买力平价计算进入 13 000 ~ 14 000 美元的阶段似乎也就达到了“倒 U 型”增长曲线的顶点。日本在 1971 年人均 GDP 达到 14 000 美元时，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尼克松冲击”带来日元大幅升值，经济增长开始减速。韩国是在 1992 年人均 GDP 达到 13 400 美元的时候结束高增长时代而进入一个相对低增长的阶段。它们的长期经济增长率都由转折点之前的年均增长 10% 左右下跌到其后的约 5%。

前面已经提到，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相比，一些结构性因素使得中国经济在较早的阶段实现了经济起飞并维持了更高的增长率。这些结构性因素也可能导致“倒 U 型”增长曲线的转折点到来得更早一些。人口转型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中国在相当早的阶段就开始了人口转型。我们在 1970 年代中期劳动年龄人口（15 ~ 64 岁）的比重就开始上升，少儿抚养率就开始下降。从发展阶段来看，这一转型比韩国大约提早了 15 年。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带来了劳动力的充足供给，抚养率下降提高了储蓄率，人口转型为经济增长带来了人们常说的“人口红利”。我们过去的高经济成长即反映了这一“人口红利”。由于“一胎化”政策在人口转型中起了重要作用，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大约每二十年经历一个周期，而不像韩国过渡得那么平滑。从图 5 显示的少儿抚养率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我国在过去 30 年有两个阶段经历了少儿抚养率的较大幅度下降，即 1980 年代初和 2001 ~ 2008 年。后一个周期少儿抚养率的下降也是 2003 年以来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并维持高顺差的重要原因。

“人口红利”来得早也会去得早。根据联合国的人口预测，在 2010 年以后我们的少儿抚养率基本停止下降，而老年抚养率将开始显著上升，总抚养率在 2013 年到达最低点之后开始上升。劳动年龄人口在 2015 年以后就进入零增长和下降。而日本是在 1990 年代初才进入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和总抚养率上升的阶段，韩国要到 2015 年几乎和中国同时进入这一阶段。因此，我们发展阶段的提高再加上人口因素，预示着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未来三四年可能会由目前的 10% 以上下降到 7% ~ 8% 或者更低一点的水平上。

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十二五计划”的建议，在提出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同时，要求逐步完善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人口政策的

适当调整虽然不会增加未来 15 ~ 20 年的劳动力供给，但对更长期的经济增长将有重要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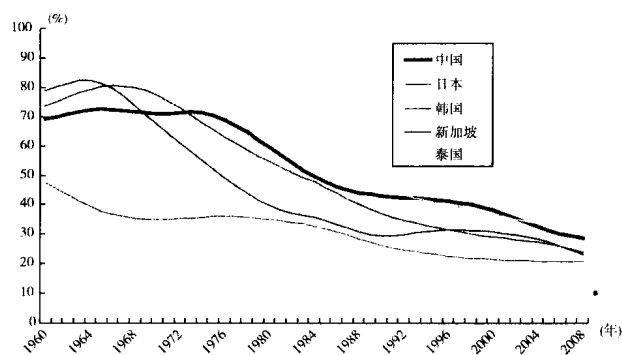


图 5 少儿抚养率

资料来源：世界发展指标（WDI）数据库，世界银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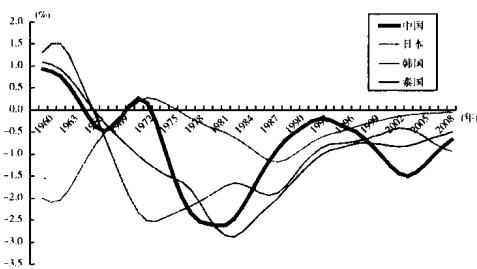


图 6 少儿抚养率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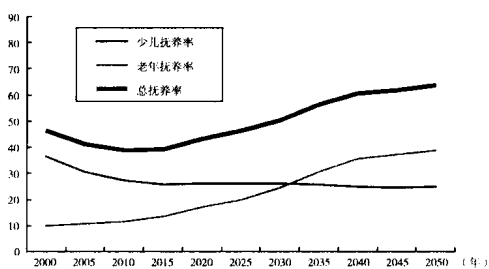


图 7 中国抚养率预测，2000 ~ 2050 年

资料来源：世界发展指标（WDI）数据库，世界银行。资料来源：世界人口展望数据库，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

持续增长的动力

事实上，如果中国的人均 GDP 能在未来保持 6% 的增长，就可以在 20 年左右的时间里步入高收入现代化国家的行列。关键在于增长的持续性。城市化和创新将是未来中国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

首先，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伴随更有效率和更具包容性的城市化策略，将有利于增加需求，改善供给，促进社会平等，成为引领中国经济未来 15 ~ 20 年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发动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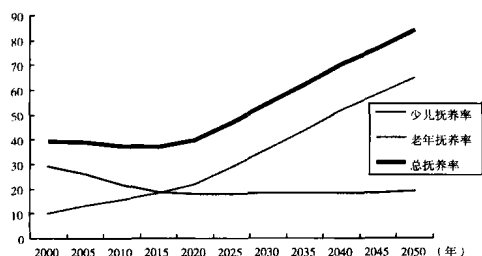


图8 韩国抚养率预测，2000~2050年

资料来源：同图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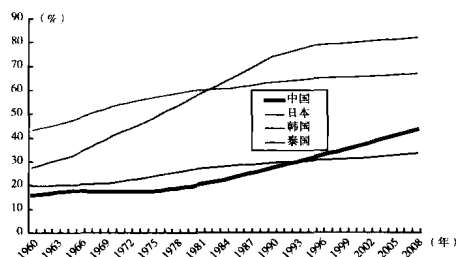


图9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资料来源：同图6。

与日本和韩国相比，中国的城市化发展相对滞后。日本和韩国在人均GDP达到10 000美元时城市化率分别是50%和72%，中国在2009年时城镇率为46.2%。不过这一数字可能高估了中国的实际城市化水平。从2000年开始，国家统计局统计城镇人口时用“常住人口”而不是“户籍人口”来计算，这样有1.8亿“农民工”被归入城镇人口，但他们并不享有城市人口的各项福利和权利。此外，统计上的“城镇”是行政区划的概念。近几年中国各地推进的城镇化，更多强调城市边界的扩张。一部分农村人口被城镇化，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居住地被划为城镇，而他们的生活方式并没有变化，即出现人们所说的“土地的城市化”，而没有“农民的城市化”（陈锡文，2010）。④

在城镇化总体水平较低的同时，城市发展的结构也存在一定问题。第一，城市规模。我们有很多人口在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城镇，而规模在100万~1 200万的大城市并不多。大量的地级城市规模较小，难以起到有效的集聚作用，不能大规模吸纳就业，也不能更有效率地利用土地资源和各种公共服务。有一些研究表明，中国的地级城市的规模只达到它们最优经济规模的一半。如果这些城市的规模翻一番，它们的人均产出将因为效率提高而增加20%~35%（Henderson，2009）。第二，城市结构。部分由于行政区划条块分割的原因，城市的专业化和分工程度不够，城市间的协作和联系薄弱，大中小城市分工协作、功能互补的城市群还没有真正发展起来。第三，区域分布。我国中西部缺乏特大城市作为自己的增长中心，这制约了中西部地区服务业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完善，导致了中西部地区资源向东部和沿海的中心城市流动，

④ 陈锡文，“中国城镇化率严重高估”，2010年8月23日。

不利于中国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

要加快城市化进程并且使城市化推进得更有效率和更具包容性，就要求我们加大在基础设施和农村教育方面的投入，并改革城乡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农村土地使用制度，促进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资金和土地市场的形成。同时也需要改革城市管理体制、土地管理和规划制度及地方财政体制。我相信这些努力所能带来的收益将是巨大的。首先，在需求方面，以建设新兴城市模式推进城市化不仅带来直接的城市建设方面的投资需求，更促使城市化后居民生活方式改变带来的消费升级需求。由于许多现代服务业必须在一定的人口和经济规模之上才能产生和发展，城市化推进所带来的人口集中和产业集聚，将带动第三产业发展和整个产业结构升级，并由此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进而稳定居民收入和需求。其次，在供给方面，城市化推进带来的农村劳动力向现代化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转移将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这一结构转变，我们的有效劳动供给不会因为总劳动力数量下降而下降。城市化发展将改善目前近2亿流动劳动力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使他们融入城市生活的主流，并有意愿也有能力为下一代的人力资本投资，从而有利于提高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后劲。最后，更为重要的是，城市化推进有利于全社会国民财富的创造和积累。伴随城市化推进而大量兴建的城市基础设施既产生投资需求又使过剩产能转化为全社会物质财富，而不是廉价出口品。城市化带来的土地升值从本质上是城市集聚效应在财富创造方面的直接体现，土地升值带来的级差地租收益完全可以用于补贴中低收入人群、补充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为稳定居民消费需求起到强力支撑作用。

在创新方面，党中央在2006年就提出了在力争在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的政策目标。当我国的增长模式逐步由要素驱动过渡到创新驱动，长期增长的持续性就得到保证。过去十几年，与外向型经济结构相关，中国企业的技术进步主要是通过对国外技术的引进、消化和吸收来实现的。外国直接投资在这一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国内企业或者与外企合资，或者与跨国公司合作成为其全球生产链中的一环，掌握了新技术和新的生产组织方式，生产出新的产品和服务。这样的创新主要还是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以国外市场为目标的。当我们步入中等收入社会，国内市场的扩张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时，我们一方面在加强对国外大企业的先进技术进行模仿学习的同时，另一方面也需要更多的本土企业通过创新创造出服务于中国市场、适合中国国情的新产品、新服务以及新的经营组织方式。

这样的一种本土创新并不必然要求是原始的独创性的创新。原始创新需要以长期的大规模基础和应用研究投入为前提,在目前我国的发展阶段,还不具备实现大量原始创新的条件。发展中国家的很多创新是通过创新生产方式和流程,以更低的成本来生产发达国家已有的产品,使这些产品或服务更适合于本国以及其他处于类似收入水平的国家的市场。这就是所谓的“节俭式创新”(Frugal Innovation),典型例子是印度 Tata 公司生产的 2 200 美元的 Nano 轿车(*Economist*, 2010)。中国的一些企业如华为、阿里巴巴等也是实现这类创新的成功案例。

创新需要高的固定成本,具有溢出效应并具有高风险,因而垄断、外部性、协调失灵、信息不对称等典型的“市场失灵”也会在创新过程中出现。市场并不能自动地产生足够的创新活动。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发挥政府的作用,并不是说政府应该直接投入一些大的项目。政府不应代替企业成为创新的主体,而是应该营造良好的政策和基础设施环境,发挥引导和推动作用,如通过普及教育提高劳动力素质、促进各种信息文化的自由交流、改善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等。从目前的环境来看,两方面的政策环境对于促进创新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个方面是改善金融环境。创新是一项高风险的投资,它需要一个有效的金融市场来分担这些风险。中小企业往往是创新的主体,而在中国,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一个长期存在但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的问题。这大大限制了一些有创新能力的小企业的发展壮大,抑制了整个社会的创新潜能的发挥。中国需要发展类似于国外的村镇银行和社区银行(homes banking),它们接触了解中小企业的情况,尽职调查成本低,可以为中小企业提供基本的融资。由于这些金融机构规模小,国家需要提供清算以及再融资等方面的支持。风险投资是创新型企业和重大创新活动的催化剂和孵化器,它不仅提供了创新所必需的资金,也为创新活动的市场化提供了知识和技能上的转移。风险投资的发展,需要一个发达有效的股票市场,以保证其可以退出并实现收益。显然,我们在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方面,还有许多方面需要加以完善和提高,才能起到对创新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第二个方面是竞争环境。前面已经说过,中小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创新往往是由新进入的企业,而不是由现存的企业来提供的。因此,实现创新需要一个好的竞争环境,保证企业的自由进入和退出。中国的一些基础性上游行业和服务业部门存在较多的行政性垄断和管制壁垒。此外,还有一些地区性的和针